



骆茹敏◎主编

奋进的中国管理科学

Chinese Management Science in
Progress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C93-092

8

骆茹敏◎主编

奋进的中国管理科学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奋进的中国管理科学/骆茹敏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03-026816-7

I. ①奋… II. ①骆… III. ①管理学-思想史-中国 IV. ①C9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5946 号

责任编辑: 侯俊琳 张 凡 苏雪莲 / 责任校对: 朱光光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无极书装

编辑部电话: 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 sciencep. 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1000)

201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9 1/4 插页: 2

印数: 1—3 000 字数: 380 000

定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言

Foreword

《奋进的中国管理科学》即将问世，我乐为之作序。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行各业都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的管理科学也应如此。我们已经有了两个30年的过去，更需要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历史是在保守和改革之中前进的，学问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发扬的，要想知道将来，就要明白过去，所谓温故而知新也。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就中国的管理科学而将这番话阐述得更详尽一些。

既然写的是中国的管理科学，那么首先就要说清楚中国的管理是什么，以及中国的管理科学是什么。本书的作者已在书中就他或她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写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此我只想从个人的角度提一个看法，供读者参考。朱镕基同志有一句名言，“管理科学，兴国之道”，他的这句话贴切地说明了管理科学在中国的作用和地位。这里，我想改几个字，将其变成“科学管理，治国之道”。前一句说的是管理科学，后一句说的是管理工作。同时，我想到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打天下易，坐天下难”；又想到了郭重庆院士就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时主张的一句话——“学以致用”。我希望读者能从书中看出或者悟出这些话的精髓。当然，我也必须向读者介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对管理科学的见解，即“管理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组织管理活动客观规律及其应用的综合性交叉科学，为人类高效率地使用有限资源提供有力的支持”。我希望，读者能够从书中了解到中国的管理科学工作者是如何做到为中国人有效使用资源提供支持的。

在中国的管理科学史上，对于两个30年的变迁也是有许多事和话要说的。前一个30年，在学科体系上是向苏联一边倒，无事无语不以苏联为师，西方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仅是以钱学森先生的声望和运筹学的名称介绍到国内。我还记得，1957年1月的一个夜晚，钱先生带领

许国志、桂湘云和我进入中南海大院里的一间大厅，向中宣部科学处的于光远同志汇报准备开展运筹学研究的情况。当时天黑黑的、灯暗暗的，可大家的心却是热热的。如今老许走了，但这一时代的特点是豪言壮语，“人民公社好，亩产万斤粮”，“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等等。当时中国的管理科学工作者大多没有这个胆量，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大跃进”的浪潮还是把他们驱赶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场。其实，这应该说是件好事。书中记载的几件事就是那个时候的案例。“大跃进”总有收场的时候，1961年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和数学所的两个运筹学研究室合并，华罗庚先生对我们说，“好好读读书吧”，我们这些管理科学工作者便重新回到研究室学习。1944年出版的由 John von Neumann 和 Oskar Morgenstern 合著的《博弈论》就是我们研究室集体阅读的一本书。总之，前一个30年是中国管理科学的孕育时代。前后30年之间的“文化大革命”暂且不去说它，而后一个30年借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东风，迎来了新的局面。这个时代是拨乱反正的时代，把前一个时代所犯下的妄想、错误统统纠正过来，国家政策是“改革开放”，指导思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的管理科学在这一新的方针的引导下，进入了重生时代。老“海归”谢幕，新“海归”登场。苏联专家早走了，美国学者来到了。中国的管理科学真正有了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始。我希望，这本书能将这一虽然不能说是惊天动地却也堪称波澜壮阔的中国管理科学发展的场面描绘出来。

近30年来，对中国的管理科学来说有两件大事应该大书特书：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同意并且建立了管理科学部；二是中国工程院设立了工程管理科学部。书中有两章分别记述了这两件大事。如果没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的资助，没有中国工程院对管理科学的承认，中国的管理科学恐怕依然会举步维艰。因为我有亲身参与这两件事的经历，因此当看到书中的叙述时，不禁感慨万千。当初筹备管理科学部时，我们还不敢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其他学部看齐而称学部，只能自称学组。成立学部则是10年以后的事了。我受学组同志们的委托，向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唐敖庆同志解释管理科学建设的必要性和汇报管理科学学组（准同于学部，简称管理科学组，下同）的筹备情况。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写到这里，我要感谢师昌绪院士。他当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副主任，正是他的鼎力支持才使得管理科学组的组建得以顺利进行。对于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科学部的酝酿和成立，我并不知情，当所里要我申报参加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院士的竞选时，我还以为是参加管理工程学部院士的竞选。当选后第一次出席管理科学部的会议时，我讲出了这个类似笑话的故事，徐匡迪院长便立即作了工程管理科学部性质的说明。附带说一句，今天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关于工程管理科学部的说法，像我犯过的笑话一样，大都是顾名思义的误解。

接下来，我要说一说下一个30年。首先，是关于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二者犹如老大和老二的关系。无论从学术渊源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二者的关系都是这样。所以，人称经济学为显学，而管理学则被笼罩在经济学的光环下，只能称为隐学了。因此，我主张，下一个30年，管理科学一定要争取话语权，而且是大的话语权。仔细阅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就会发现，其中的重大领域和重大专项都有管理科学的问题。我们的管理科学工作者就是要通过自主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话语权。其次，现今的时代是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并存的时代。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海啸揭露出过度依赖虚拟、轻心对待实物的错误，中国的管理科学界也存在这种倾向。时代的影响，不是管理科学的本质问题，也不是中国管理科学家的嗜好问题。但无论如何，下一个30年中国的管理科学学界要着重研究实物经济的管理问题。只有在坚实的实物经济的基础上，才有虚拟经济发展的前途。从以上所介绍的管理科学的定义可知，管理科学的首要任务是，在管理上保证人民衣食住行用品生产的质量和效率。最后，是关于管理科学的教育和培训。中国高等教育的是非与成败是个长年的话题，我没有资格和能力对其进行评论。不过，2008年温家宝总理探望钱学森先生时，钱先生的一句话——“这些年怎么没培养出拔尖的人才”，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真诚希望在下一个30年里，中国的管理科学工作者能集思广益，提出并实施管理科学的教育改革。书中虽然没有针对这一问题的专门论述，但是在有些篇章里还是可以看出少许端倪。

该书作者的知识经验、聪明才智、精心思考和辛勤劳动是该书具有可读性的保证。我谨以对他们的敬意和感谢，作为这篇短序的结束语。

刘源张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质量科学研究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2009年1月12日

从管理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讲,近30年来,管理科学的新名词、新理论、新思想大量涌现。在不断的研究与探索过程中,中国科学院管理科学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中国工程院,以及大量的管理科学学术团体对中国的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管理科学已经走过了大量引进国外管理科学理论的阶段,管理科学发展已进入到系统总结、分析我国管理科学发展历程,进而完善我国管理科学理论、推进我国管理科学理论发展和学科体系建设的新阶段。而对管理科学发展思想和学科体系的梳理,是管理科学发展新阶段的基础性工作。

系统整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历程,抢救、整理大量历史资料和第一手原始资料,无论对于管理科学的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是基础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在对历史资料整理的过程中,本书以时间为“线”,系统梳理了30年来管理科学的发展历程;以重大事件回顾的方式,建立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点”。“点”、“线”结合,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管理科学发展的全貌;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中国管理科学发展的未来。本书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以时间为线,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管理科学发展的脉络。

在简要回顾改革开放前中国管理科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重点回顾改革开放后中国管理科学发展的历程。从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不同学科产生的时代背景、学科定位、关键人物、里程碑事件、学科发展的历史演进与现状,以及学科发展的前沿及战略思考等问题。

第二,回顾中国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建立管理科学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关键点。

根据尚健在的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重要人物的回忆,抢救这些宝贵的资料,整理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重大事件的成立背景、发展概要、关键任务、主要贡献、主要工作,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重大事件包括中国科学院管理科学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学术团体等相关部门和管理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的管理科学建设、管理科学学科分类与管理科学发展的关系等相关内容。

第三,展望中国管理科学发展的未来。

在系统整理分析相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分析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战略。

本书坚决执行文责自负的原则,来稿照登,我们只完成把稿子变成书的工作。本书的完成要特别感谢多年来一直从事管理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在实际中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且形成了独到的管理科学理论的刘源张、于景元、汪敏熙、汪寿阳、陈晓田等管理科学的前辈和专家学者。本书希望能为广大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管理科学研究者提供系统的资料基础和研究借鉴,为广大高等院校管理学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系统学习管理科学发展背景与发展脉络,以及为从事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提供全面的管理思路。

《奋进的中国管理科学》编委会

2009年3月18日

序言	刘源张 i
前言	《奋进的中国管理科学》编委会 v

第一章 改革开放前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 许 康 1

第一节 时代背景	1
第二节 新中国管理科学的奠基 (1949~1959 年)	9
第三节 新中国管理科学的第一次创新 (1960~1965 年)	25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动乱到拨乱反正前夕 (1966~1977 年)	37
第五节 关键人物和主要贡献	47
参考文献	59

第二章 中国科学院的管理科学组——我的回忆 刘源张 68

第一节 参加工作	68
第二节 管理科学组的组建	69
第三节 管理科学组的消亡	71
第四节 记钱学森——一位管理学家	72
第五节 记华罗庚——一位管理学家	75
第六节 记朱镕基——一位管理学家	78

第三章 中国科学院管理科学组与管理科学发展 汪敏熙 82

第一节 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82
第二节 中国科学院里迎春花开	83
第三节 中国科学院管理科学组的 5 年探索	85

第四节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 建立与中国科学院管理科学部的筹组	100
第四章	实施科学基金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我国 管理科学的发展	崔俊 103
第五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与 管理科学学科发展	陈晓田 107
第一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管理科学研究由来	107
第二节	科学基金资助管理科学研究及其要求	116
第三节	管理科学发展与管理科学部的成立	127
第四节	管理科学部的资助工作与发展概况	135
第五节	管理科学部的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及其应用	153
第六节	科学基金对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的作用	161
结束语		174
参考文献		175
第六章	学科分类的研究与应用——我国第一部《学科分类与 代码》国家标准的诞生	万军 179
第一节	学科分类的历史沿革	180
第二节	国内外学科分类简况	181
第三节	中国第一部《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的诞生	183
第四节	学科分类表的编制方法及其体系结构	188
第五节	我国学科分类研究与制定国家标准的重要贡献与影响	193
第七章	公共管理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薛澜 199
第一节	引言	199
第二节	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简要回顾	200
第三节	公共管理领域研究进展	203
第四节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未来趋势及需要关注的问题	206
参考文献		208
第八章	中国的技术创新道路	许庆瑞 赵晓庆 210
第一节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轨迹	210
第二节	中国创新系统的演变	213

第三节 中国企业走向全面创新管理	214
第四节 自主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	217
参考文献	221
附录 A 重要的管理科学学术团体	222
附录 B 重要的管理科学教育机构	255
后 记	骆茹敏 293



第一章

改革开放前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

许 康

第一节 时代背景

国际学术界讨论某一门学科的历史时，一般将其区分为前史、雏形、定型（常规）等阶段。管理科学这门学科的经济社会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管理方法也逐渐从经验型向学理型演进。西方管理学提到的各阶段（及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早期的亚当·斯密（A. Smith, 1723~1790 年）、欧文（R. Owen, 1771~1858 年）、巴贝奇（C. Babbage, 1792~1871 年），20 世纪前期科学管理学派的泰罗（F. W. Taylor, 1856~1915 年）、吉尔布雷斯夫妇（弗兰克，F. B. Gilbreth, 1868~1924 年；丽莲，L. Gilbreth, 1878~1972 年），行为管理学派的甘特（H. Gantt, 1861~1919 年）、福雷特（M. P. Follett, 1868~1933 年）和梅奥（E. Mayo, 1880~1949 年），管理过程学派的法约尔（H. Fayol, 1841~1925 年）、莫内（J. D. Mooney, 1884~1957 年），都曾为旧中国某些学者所知晓；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的管理科学、系统管理、决策理论等学派，则与本章所描述的历史时期平行。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引进了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则“反帝反修”并举，使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学也有所了解，但都无所适从，只能靠实践出真知，独立自主地摸索前进。

一、新中国成立前引进科学管理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于 1865 年开展洋务运动求强、求富，逐渐引进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和

工商管理知识，但实际效果甚微。到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过，由于帝国主义挟其长技步步紧逼瓜分豆剖，中国屡战屡败退无可退，达尔文进化论帮助国人悟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激起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并唤起工农大众推倒“三座大山”。政治改革（清末维新运动和新政）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苏维埃运动），军事上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济上民族工商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两次艰难的突进，思想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建树，交汇成波澜壮阔、翻天覆地的社会大革命。落后要赶上先进、弱小要战胜强敌的意识无不促使中国人择善而从，讲究战略战术，重视科学技术，其中就包括管理方法。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的第三条就是管理。当延续1600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在 1905 年被废止时，发生了古今中外罕见的出国留学高潮，并分成几个波次，其政策导向和价值取向随时代变迁而有所区别，留日、留法、留俄以政法人文为重心，留美、留英、留德则以科学技术为重点。尤其是以庚款为支撑的留美学习，在强调理工科之余，对其他各科均给予了一定的派遣名额。半个世纪（到 1957 年）中，虽然出国（返国）总人数不过万人（含自费生），然而对管理科学这门正在形成而且美国相对领先的学科（开设于商学、经济、工程、数学等院系）而言，某些中国留学生却能捷足先登，介绍与引进的速度相当迅速，其主观愿望甚至超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水平。

这样，尽管本书限定的历史时段是 1949 年以后，主体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但作为中国管理科学的“前史”，我们似可将其起点提到 100 年前。这里举出若干标志性事件：

(1) 1908 年周典选择沃顿学院、1910 年朱庭祺成为哈佛大学商学院 MBA “特别生”，学习有关科学管理课程（按：哈佛大学商学院成立于 1908 年，在全世界率先讲授泰罗学说）。

(2) 1911 年曹云祥入读 HBS（哈佛大学商学院），1914 年成为最早正式获得 MBA 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当时该院每届 MBA 不过 30 人（因而曹氏可进入前 100 人之列）。

(3) 1914 年 5 月 4 日泰罗复信中国留美农学硕士穆藕初，同意并支持他将 *The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一书译成中文；1915 年 5~8 月，译稿在上海《中华实业界》杂志上发表；1916 年 6 月译稿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为《（工厂适用）学理的事业管理法》。作为对照，该书日文译本于 1912 年出版，而当时社会发展程度与中国相近的土耳其直到 1946 年才翻译出版此书。

(4) 1915 年 4 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本科生杨铨（杏佛）在中国

科学社社刊《科学》杂志（月刊）上发表《人事之效率》，他升入 HBS（攻读 MBA 学位）以后，又相继发表了《效率的分类》（1916 年）和《科学管理法在中国之应用》（1917 年宣读，1918 年发表）。

（5）1917 年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科教授徐崇钦立项研究《最新发明之科学管理法》。

（6）1919 年萨君陆、黄世衡从日文本合译《能率增进法》，先在《东方》杂志上分期发表，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 年张廷金（HBS “选课生”）编译出版《科学的工厂管理法》，并用作交通大学工厂管理课程教材。

（7）1920 年林癸在《学艺》和《林学》杂志上发表了《运材人力之科学的管理》等文。

（8）1925 年钱昌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兵力集中的算学解说》一文，首次介绍了运筹学早期定量分析经典成果——“兰切斯特战斗动态理论”，即运用二元线性微分方程组推导出战斗双方减员规律，以及战斗力平衡的“平方律”等（按：原作发表于 1914 年，验证于 1956 年）。

（9）1926 年邹韬奋（圣约翰大学文科毕业，初任穆藕初秘书，时任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编译了几种有关“职业心理学”的书籍。

（10）1928 年潘序伦（HBS 的 MBA，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出版《成本会计》等。

（11）1930 年孔祥熙、穆藕初主掌的工商部，接到国际科学管理研究会（总部在日内瓦）总干事厄威克（L. Urwick）的建议，决定在当年 6 月创立中国科学管理学会（后称为中国工商管理协会），选出全国官、产、学三界 24 位著名人士为理事，出版《工商管理》（月刊，1934~1937 年）。1930 年 11 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工商会议，将“科学管理法”列入议程。

（12）1930 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考察日、美、欧等 9 国的企业、高校和学会，向专家咨询科学管理，回国后在该企业内全面推行，但遭到职工抵制。1932 年为挽救“一·二八”事变该馆被毁的印刷厂，商务印书馆推行节约原材料和标准化，取得实效。上海市的“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的一些厂家也有尝试。

（13）1930 年《东方》杂志专栏约刘洁敖、杨东莼等介绍“合理化运动”。1935 年薛暮桥在《工商管理》月刊撰短文介绍苏联刚刚开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

（14）1935 年何清儒等成立中国人事管理学会，研究科学管理，并出版《人事管理月刊》。

（15）1932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甘乃光（师从芝加哥大学行政学家

L. D. White) 发起“行政效率运动”，刊行《行政效率》(1934~1936 年) 杂志。不久，他重点研究文书档案规范管理，并在行政院系统取得成效。抗日战争时期有行政效率研究会，刊行《行政研究》(1937 年~) 杂志。

(16) 1935 年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双聘教授陈立撰写《工业心理学概观》。潘菽、萧孝嵘、王书林等也分别开展应用心理学、人事心理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17) 1940 年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家开始研究劳工问题，史国衡的《昆厂劳工》报告以及 1943 年费孝通去哈佛大学从事的研究工作，竟然与梅奥人际关系理论暗合且有所深化。

(18)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指导和推动在公营企业、事业机关开展“工作竞赛”，出版《工作竞赛》(1941~1948 年) 期刊。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资源委员会和军工署系统的企业已经注意到成本会计和质量管理，曾派出人员到美国学习工业工程。

(19) 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也结合“大生产运动”，开展劳动竞赛，评选赵占魁、沈鸿、钱志道、李强为特等劳动模范，并将此命名为“赵占魁运动”(1942 年)。毛泽东于 1942 年 12 月出版《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系统总结了边区政权对工业、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及军队、学校的生产等方面的管理经验，强调经济核算、提高效率、互助合作，也注意奖励制度。

(20)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指导战争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基于调查统计，进行数量分析，准确地部署和预计了各阶段的进程。特别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运筹思想，在三大战役中得到了光辉的体现。他的《常委会的工作方法》是对革命政党和领导机构的管理方法的科学总结。此外，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还率先引进了苏联的工厂管理和经济建设经验。

其中，以上两条是革命根据地独立自主的管理成果。

二、经济恢复时期的宏观管理和计划经济的初步尝试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时，接手的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剥削长达百年、经过多次战争破坏的一副烂摊子，百废待举。中国共产党积 28 年的革命和战争经验，拥有一大批优秀干部和久经锤炼的政治军事机构，领导和组织过数以亿计的群众实施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此后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解放区立即恢复生产，稳定经济，镇匪反霸，完成全国性的土地改革；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企业，迅速掌握了控制着全国经济命脉、居于优势地位的国有经济部门；对广大的民族工商业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政策；在几亿获得土地的农民中及时地引导他们开展变工互助，发展农业生产。以上是三年(1949~1952 年)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工作。

从政治学（以及曾长期作为其分支学科的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中，就明确规定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管理，以及“议行合一”、人民民主管理、民主集中制等制度设计，新中国继承和发展了这些基本原则^①。新中国的政府体制依据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为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机关，它负责组织政务院，政务院是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它还负责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是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以及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及检察机关；而且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人员，组织地方人民政府。中央集权的程度相当高。

从经济和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值得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对天津工商界的调查研究和讲话，毛泽东根据薄一波的汇报，将其概括为“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经济工作的直接主持者陈云，受中央委托，在上海召开五大行政区财经领导干部会议，总结了控制市场、抑制通货膨胀、平衡财政收支的经验。接着，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以及为配合抗美援朝，开展了“三反”、“五反”、“增产节约”运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政府机构的运行实施有效管理，并为大规模经济建设作了积极准备。从1951年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两次（2月、11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到1952年11月正式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这标志着中国已取得了宏观计划管理和微观效益管理的初步经验。毛泽东于1952年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将工业化和三大改造并举。与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步，1953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李维汉的报告，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的基本方针。

从国家机关的组成及职能规范来看，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国务院的各个部侧重于对国家一个方面行政管理的工作，其中管理经济工作的部门，按专业化归口管理的方式设置，专管某个行业的经济建设，并归口直接管理的企业；国务院的各委员会（主要有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后来增设的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属综合性机构，实行综合管理；国务院的8个办公室（政法、文教、重工业、轻工业、财贸、交通、农林、对私改造）分口管理各有关部门；国务院的直属机关主办各项专门业务工作。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内各

^① 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347